

讀者參考

①

博集广汇

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风险

北京申奥关键一票输在哪里

女部长的魅力

《北京人在纽约》续篇梗概

世态风情·色情种种

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倾向

学林出版社

目 录

观察与思考

- 4 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风险预期

天下事

- 14 “复关”，走到历史分水岭
17 北京申办奥运会关键一票
 输在哪里？
18 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破裂的
 前前后后
22 在朝鲜核检的牌局上

人物春秋

- 25 宋健自述：珍惜机遇
31 女部长的魅力
 ——一个记者眼中的吴仪
37 坐着轮椅荣归的世界级
 明星叶乔波
42 让世界首脑曝光的女记者

社会透视

- 47 灰收入：中国廉政病床
52 下个世纪中小学谁执
 教鞭？
56 股票为什么凉了？
58 “洋月亮”为何不圆了？
 ——三资企业亏损问题分析

文艺园地

- 60 “女皇”出山
 ——刘晓庆和制片人刘大印
64 张艺谋：写尽潇洒，重塑
 风流
67 斯皮尔伯格与《辛德勒的
 名单》

名人婚恋

- 69 邓拓和丁一岚的爱情故事
73 叶挺与李秀文的忠贞爱情
75 赵青与刘德康的生死恋

世态风情

- 79 知识分子的痞子化倾向
84 小人物“关系网”
 ——外地人在北京
93 色情种种

新书架

- 100 《中国民居》

往事钩沉

- 102 蒋介石和丘吉尔在开罗
 会议上的争执
105 促成广岛悲剧的血战
109 前西德总理勃兰特下跪
 华沙

中外书摘

- 110 《北京人在纽约》续编梗概
116 《你误会了我》梗概
-

港澳台之窗

- 120 香港人与1997
123 台湾蒋家王朝果真行将结束?
125 香港准备输入一千名大陆人才
-

国外见闻

- 126 一位女作家眼里的俄罗斯
132 美国人眼中的日本人和日本人眼中的美国人
137 北欧四国演义
-

九州方圆

- 140 南北差别扫描
140 心态优势：广东的宝贵财富
141 蛇口至香港将建跨海大桥
141 深圳市人大代表质询“高尔夫”
141 中国大陆首家私营民航机场试航
142 上海建“地下商城”
142 “名人别墅”拍卖给庐山带来“滚动效应”
143 天山南北涌现“家庭庄园”
143 到中疆边界买玉去
-

- 144 杭州“龙井”为何变成洗手水
144 三省争捞“中山舰”
145 高邮兴建我国首座邮政博物馆
146 北京的民俗婚礼
146 南京出现“承包家教”
146 苏北有个“试卷村”
147 北极村：独特的风景
-

改革信息

- 148 国家体改委提出改革进程表
148 国家产权制度改革五步到位
149 '94我国高等教育有哪些改革?
150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将有新举措
150 我国将推行职业资格证书
-

新论点·新见解

- 151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五个支撑点
151 朱镕基谈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152 中国式渐进改革道路特征
152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哲学观念的现代变革
153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五个难点
153 更有活力的“第三种公有制”
154 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155 解决经济问题的“自行车原理”
156 房地产业“过热”了吗?
156 道统、学统与政统
157 中国股市需要反思
158 “王朔现象”是文艺与商业的结合产物
158 文学创作不属于商品生产范畴
-

补白

13 你知道吗：我国能背多少外债？

30 世界五大智囊机构

46 西洋人的十大迷信

55 《三字经》被选入联合国儿童道德丛书

55 日本孩子不玩游戏机

57 显见差异的读书观

63 中国十大古典名曲

74 麦当劳不用靓女

78 法国人不喝XO

101 我国仿古建筑缩微景观知多少？

108 《西安半月记》出笼前后

115 名人轶话

115 时隔百年的巧合

139 当今全球超级工程

159 幽默画

160 编者与读者

《读者参考》丛书

博集广汇

副主编：林 雨

编辑：《读者参考》编辑部

地址：上海金沙江路长风二村51号15楼1室 邮政编码：200062

出版：学林出版社 地址：上海文庙路120号 邮政编码：200010

邮购：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

地址：上海永嘉路25弄3号 邮政编码：200020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丹阳市新华印刷厂 印张：5 字 数：18万

责任编辑：金 辉 董又谷 封面设计：朱 文

ISBN 7-80510-957-5/Z·61 1994年8月第1版 定价：3.00元

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风险预期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在年前问世的，报章上的言论多以“宏伟蓝图”、“进军号角”等等各种豪迈的字眼尽书其伟大。不过就在常人为这些必要的评论所振奋时，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们在真正领悟了《决定》的内涵和意义之后，已经开始考虑其操作中将面临严峻挑战了。

“过热”还是过虑？

吴敬琏教授认为，为了保证已经定下来的改革措施能付诸实施，首要任务就是要继续创造一个好的经济环境，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否则，很可能使新的改革出台伊始便迈不开步子。

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共识。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共同从事的一项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表明，中国在1993年夏季开始的宏观调控之后，1994年的经济“软着陆”有几种可能的前途：

第一种结果：各项调控措施力度掌握得当，上下协调一致，使经济过热势头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开始下降，经济增长率也降低到

10%左右。在相对紧的经济环境中，加大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力度，推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经济发展平稳过渡到稳定增长期，并能持续若干年。

第二种结果：宏观调控力度过大，过度紧缩造成经济增长过分失速，出现经济“硬着陆”。虽然投资规模和物价上涨被控制住了，但没有将调控的重点放到调整和优化结构方面。这种做法不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失，而且还将成为下一轮重新“过热”的出发点。

第三种结果：由于回避结构调整的矛盾，在经济减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压力下，经济改革裹足不前，在地方和企业的一片叫苦声中优柔寡断，为刺激经济回升匆匆放松银根和投资规模控制，放松货币发行闸口，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过早反弹，通货膨胀重现，最终使决策部门不得不以“急刹车”调整压缩。

专家们在分析中说，目前第一种结果是所希望的，第二种结果短期内不会变为现实，需要警惕的是出现第三种经济过早反弹的结果。

吴敬琏也说，增长速度只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政策等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前者发展变化的原因。在我国没有很多闲置资源作追加投入的条件下，增长速度能够搞到多高，取决于经济效率真正能有多大提高。为了防止出现“过热”，增长速度不宜作为指导工作安排的中心指标。

不过，愿望和期待都不能代替现实。张卓元教授，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在冷静分析经济现状以后说，按目前走势，看来1994年的经济实现上述分析第一种结果的希望不大，实现第二种结果的可能不大，而走入第三种结果——没着陆又起飞，最后导致硬着陆可能性很大。他还说，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在第一种和第三种之间，如能相对接近第一种结果便是幸事。

当然，有些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过热”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来就是周期性的，每七年为一周期，三年半的时间为高速发展期，三年半的对间为调整期。在高速发展期，经济发展速度偏高，达到13—14%，实在是很必然也很正常的。即使分析通货膨胀，也要看产生通胀的原因。中国1993年以来的通胀与价格放开、提高营业税等因素相关，并非货币总量投放过多所致，所以不宜夸大其危险性。

萧灼基还有个清楚的计算：1993年上半年，居民的实际收入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在扣除物价上涨

因素之后，城镇居民的收入仍提高了12%，而农村居民收入则增长了4%，既然收入增长高于通胀幅度，有些专家对于“居民预期偏离正常”的担心就大可不必了。

那么，1994年的发展速度以多少为宜呢？萧教授的看法是：不能低于10%。

萧灼基的观点也有颇多响应。赞成者说，不怕慢，就怕站。中国经济总是走走停停，现在跑起来是正常的，而且，“过热”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准确。

谁会“软化”改革？

改革措施是要由人来具体操作的。中央新出台的改革措施，直接涉及一些行政主管机关和部门，而且是那些传统体制渊源最深广的机关部门。让那里的人自己告别传统，主动推进经济体制和本单位职能的重塑，无异于自己持刀自动手术。如何才能确保这第一刀下得去呢？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投资与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海南三亚银建公司总经理的青年经济专家方风雷，他的看法是一句话：“难就难在怎么才能保住力度和进度。”

方风雷说，必须承认，在银行、外汇、财政、税务、外贸这些关键性的领域，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了，传统力量的惯性特别强大。怎么才能确保那些过去在旧体制里按旧程序作业的人现在能够主动积极地推

进本系统改革呢？如果由于人为的因素，使这部分改革将要出台就裹足不前，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全局的影响就太大了。

他认为，落实新的改革措施当然应当讲究策略，分段推进，但无论如何，都得特别强调坚决落实执行中央《决定》的必要性，防止相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用种种借口动摇领导的决心，降低改革措施的力度，使已经定下来的改革要求不能兑现；或者拖延这些改革措施出台的时间，最后使它们都胎死腹中。

当然，“软化”改革的危险恐怕不仅会来自具有保守思维方式的具体操作者，还有可能来自在十余年渐进改革中靠钻“双轨制”之隙得了大量实利的既得利益力量。这种看法也是学者们的共识。

只要随便翻翻报纸、看看电视就明白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白领犯罪”已经开始以牟利百万、千万元计了，已经是境内境外地出出进进了，已经遍布东西南北从京城到地方的各个省份了！

有些数字足以让人怵目惊心：

——仅1987年一年，全部控制商品的差价即在约1300亿元以上，资金利差约为200亿元，外汇价差约为500亿元，全社会差价总计在2000亿元以上。差价如此之巨而制度漏洞如此之多，即使各种钻营者只赚取差价收入的5%，金额也可高达100亿元以上！

——在1992年一年，投入贷款

总额约计2.2万亿元。而由于利率过低，资金需求强烈，私下的回扣至少可达10%。仅此一项，就有了2200亿元的潜在贿金！

这既是既得利益者的经济机会之一斑。

谈起这些，经济学博士林毅夫这样描述：“改革无疑要对旧的利益结构进行调整。但由于在改革和调整利益结构的同时，新的竞争环境没有相应形成，在创造出新的获利机会的同时，未能把每人或利益集团放到相同的竞争条件下，这就造成了对改革的期望偏差。一部分人在改革中产生过高期望，如若未能完全满足，便形成对改革怀疑和犹豫观望，另一部分对改革预期不好的社会集团则会对某些改革措施进行抵制。在这两部分人中都可能产生借机‘捞一把’的想法和行为，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和风险。”

实际上，这些年来滋生的既得利益力量绝不囿于某些行业、某些单位，不是个边缘清晰的利益集团。而且，也并不是每一个既得利益的人都已经成了反对继续改革的自觉力量，不过，既得利益力量从上到下、从沿海到内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存在着，这是事实；既得利益力量不仅存在于工商界及经济管理部门，而且已经延伸到政府其他部门，延伸到政法界、文化界、理论界、舆论界，这也是事实。

吴敬琏在分析这种情况时说，长期以来“双轨”制并存，提供了以

权谋私和利用市场发育不良牟取暴利的巨大机会，才使这种具有侵蚀性的既得利益力量得以生长。所以，这种力量及其代表者并不一概地反对改革，更不会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不过，他们很自然地喜爱双轨制并存的局面，主张行政干预不要撤，市场规范慢慢来。这样，面对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为中心任务的深层次改革，他们就会本能地反感和反对。

正因为此，吴教授提醒说，那种极有能量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在新的改革措施中塞进私货，打着“改革”的旗号，创造新的“权钱交易”、“内线交易”、“金钱游戏”的机会，致使改革被扭曲变形，最后走到邪路上去。其实，在过去多年的改革历程中，这样的事我们已经见得很多了。

经济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眼下行将推出的新一轮改革称为“攻坚战”。在迈出‘94改革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实在应当把“攻坚”准确地理解为科学的表述而非文学的渲染，从而在新的改革任务面前更具坚强的决心和韧性，拿出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来。

思想解放探讨之一：

碰碰国有制

一部分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改到现在，在若干重点中，最主要的是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而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核心又是

产权问题。

然而，虽然此次全会《决定》终于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案，并且对于如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作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说明，从而把更新公有产权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但在现实观念上和做法上，传统的坚持公有制的方法其实还非常顽固地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国到了1992年，尚有1.36万户大中型国有企业，产值约计1.35万亿元。而这些企业2/3亏损，余下的主要也是微利。这种情形，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对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全局是一种怎样的负面影响呢？

范恒山总结了现存的传统的坚持公有制方式的四个特征：

——只重形式，不重内容与效果。

——只重“块头”大小，不重实际影响。

——只重物质形态，不重货币形态。

——只重静态固守，不重流动增值。

他说，这是“被动”地坚持公有制，其结果只能使国有资产的存量患“空壳症”，增量患“萎缩症”，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改革15年，国有企业该向何处去？这已经成了我们改革整体事业中的大难题。从80年代中期的承包制，到前年以来提出的转变企业经

营机制，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放权让利的范围内做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却始终没有走出困境。问题的关键，就是鼓槌没有敲到产权上。

范恒山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明确产权关系，对于“人人所有、人人无责”的模糊的公有制形式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

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闭幕前夕，经济学家于光远在他北京的寓所写了一篇短文。他说：“我希望改革更激进些，不但要深化，而且要加快。”他还觉得现在应当花大气力“来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问题”。

思想解放探讨之二： 从“赶超”到务实

一些很有才华的人们从农业的视角观察着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探索着关于发展的理论。须知中国有10亿农民，中国至今还是个农业国家。

林毅夫博士，这位青年经济学家当年是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舒尔茨教授的弟子，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研究员，多年来专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林毅夫说，这个《决定》是非常好的文件，是改革以来最全面的文件，《决定》对于整个宏观政策环境的设计都是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准则的。可在执行文件的时候，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老习惯，在思想上倾向那种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贯

彻《决定》的困难可能就会比较大。

比如《决定》提出建立要素市场，让资金、原材料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还提出汇率放开。可是许多产业按真正市场要求来选择是没办法上去的。有些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了生存潜力，但大多数还不行。有的被认为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如果利息太高就支持不了；有些产业必须从国外进口设备，汇率太高也会有困难。为了支持这些产业，是不是又得搞照顾性的配套政策呢？

因此，得在发展战略思想上有个转变。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决定》提出的各项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那么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思想呢？林毅夫说：比较优势战略。

比如中国人多地少资金稀缺，就应该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只有充分利用了这种比较优势，产品的价格比较便宜，在国际国内具有竞争力，才能较快地积累资金，使资金从相对稀少变为相对丰富，进而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

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说，中国建国初期主要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从60年代就开始考虑调整战略思想，提出了“农轻重”的战略方针；但即使到了现在，很多人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还是没有走出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思

雄方式。

老一辈经济学家、中国最有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杜润生，对此发表了如下看法：

发展与改革，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有时也可以给改革让路。某些年度适当慢一点，也有必要。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有些事是既能促进改革又能加快发展的，在中国现在的形势下，得把这样的事抓住，这就是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以杜老之见，中国的劳动力多，是我们的包袱，也是机遇。中国应当下气力发展资本量小、就业量大的企业，推动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就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解决就业应当是改变中国社会、完成发展任务的中心的中心。

当中国新一轮改革行将出台的时候，这部分经济学家独到而又务实的思考应当给人以启发。

思想解放探讨之三： “弱政府”？“强政府”？

去秋以来，北京有一位青年学者和他的主张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很大震动和争议。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胡鞍钢博士和他做出的中国近年来国家能力不断下降的结论。

胡鞍钢和一位名叫王绍光的大陆留美学者在美进行了两年多的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于去年5月完成了一份国情报告。他们认为：由

于近年来中国中央政府吸取财政能力过低，中国政府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弱政府”。

胡鞍钢觉得，这次中央《决定》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以制度创新为主目的改革阶段。但是《决定》在贯彻中风险很大。最让人担心的是在1994年按《决定》实行分税制的时候，地方的税还可以，可中央的税收不上来。现在每个省区都在想局部利益，不容易考虑国家和中央的利益。就像“博弈论”里的社会悖论，英文说的DILEMMA，一条船只能搭15人，如果30人都想抢，结果很可能使船沉掉。

他说，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古已有之的大问题。而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个问题从未处理好。44年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大的变动已有15次，小的还有若干次。两者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制度、没有规范，因而也并不稳定。“发挥两个积极性”当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准则，但仍有模糊性，没有明确各自的事权，解释范围太宽泛。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当以成文法明确、具体地规定下来。

综观世界，正视国情，依胡鞍钢之见，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强中央、强政府。今后的中国不可能实行地方分权体制，也不可能实行中央集权体制，应当是混合型。具体而言，就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在这

里，统一性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是统一的，中央政府是承担此功能的唯一角色，地方政府只能是执行者；社会保障必须是统一的；国内市场，包括资金、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要素市场必须是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必须是统一的；税制必须是统一的。

其他的就是多样性了。概括起来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做任何中央政府不禁止做的事，中央政府不得对地方政府独享的权力进行干预。地方政府有权抵制中央政府与成文宪法不相符合的规定和命令。“这就是权力的纵向制衡。”胡鞍钢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制度化，而最理想的就是分税制。研究表明现在实行的财政包干制度是非现代的、非规范的、非科学的。其负面效应，就是形成了现在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他还说，改革做终应当走出“权力经济”、“政府经济”的传统框架，如果只是中央和地方在行政上层层分权，地方政府机构庞大、职能繁多、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局面没有解决，那就离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还差之甚远。

中国应当尽快实行彻底的分税制！这就是胡博士的主张。

同样赞同分税制，同样认为“权力经济”状况必须结束，一些经济学家又对胡鞍钢的某些基本观点持有异议。著名经济学家吴明瑜即是其一。

他说：首先，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都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十多年来的改革，中央注意把权力加大到地方政府身上，注意培植地方政府的自主能力，带来了非常大的成效。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性，就没有这十几年改革和发展的成就，没有现在特区、开发区到沿海开放地带形成这种全新的经济局面。这是不能否认的。当然我们绝不是仅仅把权力转移到地方政府就够了，最终还要把应当转赋予企业的权力转移到企业。但是解决高度集中统一，把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地方，无疑是十多年改革一个非常直接的成果。

再者，何谓国力增强呢？不能把国力仅仅理解成中央财政能力。“藏富于民”有什么不好？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有什么不好？“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了每年6%，但老百姓的储蓄从1952年到1978年在示意图上几乎是一条平线。到1978年底，全部储蓄存量才210亿人民币，平均每人才20元。现在储蓄直线上升，到1992年增长50倍，1993年10月，中国已有1.4万亿人民币的个人储蓄。这就是国力的一部分。各种经济力量都是国力的表现，而财政在国家收入中的比重是很小的。改革开放十多年，中国的国力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国内外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如果真是如胡博士等人研究所言，中国的国

家能力下降了，何以解释江泽民主席应邀去美国受到的格外重视呢？

此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不仅仅是财政关系，用财政比重来说中央政府是“弱政府”并不科学。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长期党的统一领导的基础。地方政府的选举也是中央认可的。即使某些地方力量过强，其实中央说收也可以马上收回来。现在提出中国有了“诸侯经济”的说法，会造成不必要的紧张情绪。

当前的新一轮改革，的确包含着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调整。据吴明瑜分析，眼下有四个大问题正摆在人们面前：

——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分工必须法律化。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必须还权于企业、社会和中介组织。这部分将比过去15年的中央放权给地方还要难得多。

——在当前适当加强中央调控能力的同时，要注意鼓励地方的积极性。

——地方党政之间的关系应当进一步调整，以保证中央政府的政令通行。

中国改革十几年实行财政分成和承包制，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也在某些方面确实滋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现在，承包制应当让位于分税制了，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中并无很大争议。但《决定》确定的分税制

如何推开呢？胡鞍钢是主张“彻底”、“尽快”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要讲究些渐进的策略。例如吴明瑜等人提出了“共赢”方针。

他们说，分税制包括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在早期执行中，共享税这部分要处理得谨慎些，得考虑到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地方利益。当然也不能维持现状。要说到新一年的改革风险，恐怕就在这里。比较好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在地方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再由中央拿多一些，逐步提高中央分成的比重。最终，当然要达到增加中央财政能力的目的。

谈到‘94改革中的中央地方两级关系，一些学者想得很细。他们说，除了分税制，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会牵涉到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问题。比如现有的专业银行都转为商业银行了，但这些银行仍主要是从“条”上下来的，可不可以允许和帮助地方像广东那样成立地方商业银行呢？再比如将来期货市场、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等等都要批准，在规范没有形成之前，这个“批”在地址的选定、限额的分配上是否也应当注意避免过去计划经济的影响呢？

事实上，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而新一轮改革正是利益的深层次的合理调整。在这个过程中，长期以来旧体制酿生出的“条”“块”冲突必会表现为许多绕不开的难点。“块”的地方保护主义苗头让人担忧，而

“条”的传统惯性和低效死板同样使人焦虑。更主要的是，作为政府机关，两者都面临着从根本上改变职能的艰难转变。

否则，中国改革出现大的反复，或入歧途、或归旧路，恐怕就是难免的。

尽管学者们的具体主张和侧重不同，争论颇炽，但他们都说，这一切在根本上是与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正因为此，这部分改革才很难很难。

无知即是大敌

采访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最简单的：’94改革行将推出之际，在中国，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读懂中央《决定》？

回答当然只有摇头，只有叹息。许多经济学家郑重提出，学习现代经济学知识，已经成了完成改革任务的当务之急！

无知，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最大的敌人。因为我们即将从事的不再是靠直觉和常识进行的初级改革，而是构建繁复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经过40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已成为一部十分复杂、十分精巧的配置资源大机器。经济学也已成长为一门具有繁茂分校的科学。理解改革的整体方案，创造改革的理想环境，实施改革的具体步骤，克服改革遇到的障碍，我们都实实在在地需要知识，需要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知识。

青年学者方风雷很直率地说：中国有三盲：文盲、科盲和经盲。现在经盲的问题最突出。多数即将实际操作改革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缺乏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所以《决定》操作起来会有相当困难。现在必须普及经济学的ABC。

吴敬琏在他为《中华工商时报》撰写的评论员文章中这样呼吁：“现在应当在干部和群众中开展一个学习运动，学习邓小平著作，学习市场经济知识。我们常说，市场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进行理论学习，是用最短时间掌握这一伟大成果的最佳途径。可以说，只有站在人类当代文明的高度上，才能把握《决定》的精神实质，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建立起来。”

与普遍无知相联系的，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就是现代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匮乏。

一些青年学者提出，中国近些年提拔的干部中，对学经济的人重用不够。领导干部中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现在从落实《决定》的实际需要出发，应该把学过现代经济理论的这批青年才俊真正用起来。

他们还引述了旅美台湾学者、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高希均提出的一项建议：现在在美国有5万多名大陆留学生，搞经济的至少有上千个，已经有上百个拿了博士学位。中国大陆应当像当年

的台湾一样,把这样的人才请回来,可以把他们留下工作,也可以请他们作为专家作中短期访问。这些人一定能发挥很大作用。

.....

就这样,在'94改革出台之际,中国那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们想了很多,也谈了很多。这些多年来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奔走呼号的人,这些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中国总体经济改革方案设计的人,这些最能够理解改革真谛、最殷切地盼望改革顺

利推进的人,很认真地面对新一轮改革将面临的风险和困难,提出了可能的挑战和应对。

作为清醒的思想者,他们严肃地说:在1994年,改革没有浪漫曲。走出第一步将很难很难!

可又有谁能说,作为改革的战士,他们对于明天不是充满了成功的憧憬和信心呢?

(转摘自《新华文摘》1994.4.)

原载《改革》1994.1.

胡舒立文)

你知道吗:

我国能背多少外债?

1985年,我国外债余额由以前的40亿美元骤然上升至160亿美元的高点。3年后的1988年,外债余额又突破400亿美元。有人提出疑问:90年代的未来几年,我国还能承受多少外债?

一定时期内的外债承受力主要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该时期一国经济可承受的、以还本付息为形式的最大资本流出额。二是该时期一国经济可承受的最大外债余额净增额。

按第一方法测算。一般国家的偿债率风险界限为20%,发展中国家25%。根据国际银行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偿债率风险界限以15%为宜。90年代我国所能承受的最大还本付息规模还要取决于出口

创汇的规模及增长速度。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前景是比较乐观的。预计90年代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将会与80年代10.26%的速度持平或略高。根据我国偿债率为10%—15%和出口增长率为10%—12%测算,1991—2000年的9年期间,我国最低方案还本付息总额可达1000亿美元上下,年平均约120亿美元;最高方案为1800亿美元上下,年均约200亿美元。

按第二方法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外汇收入可承受的外债余额,在90年代中期将是1000亿美元左右,2000年时,将是1600亿—1900亿美元。以1991年外债余额实际值为基数的话,不含短期债务的债务余额,到2000年将净增约1000亿—1400亿美元。

总之,我国90年代所能承受的最大外债余额增量应在1000亿—1400亿美元。(摘自《华商报》)

“复关”，走到历史分水岭

预言 ≠ 现实

大概是在一年多前的这时候，“复关”——恢复中国 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资格——曾是举国关注的热门话题。

更早些，有关专家就预言，中国复关早则在1993年上半年，迟则不会超过1994年元旦。

然而，1994年元旦前从瑞士日内瓦传来的消息，预言终究未变成现实——

来自117个国家和地区的GATT缔约国谈判代表达成协议，历时7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

这次会议初步确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并决定1994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部长级会议，签署“关贸世界贸易协议”，1995年1月1日该协议正式生效。同年7月1日，WTO正式成立，从此GATT将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世界经济舞台……

中国，中国的位置在哪里？

根据WTO规则，凡是GATT缔约方，届时将成为WTO成员，否则必须重新申请加入。据此，中国作为乌拉圭回合的全面谈判方，

若不能在1995年1月1日前复关，就没有资格成为WTO创始成员，若重新申请加入该组织，即意味着必须面临更苛刻的谈判条件和更多的“入门费”。

1994——中国“复关”已到了时不我待的紧要关头。“复关”，走到了历史分水岭。

为了取得 GATT 门票

GATT，1947年10月30日在美国支持下由23个国家签约，1948年1月1日生效。它是当今世界唯一较全面地规定国际贸易准则和规范的全球性多边贸易协定，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构成协调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的三大支柱。

若中国如愿复关，中国产品出口额将有大幅度增长，尤其是纺织、机电、轻工等产业的出口前景将更令人乐观。除了各主要发达国家给予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外，还可要求取消对中国的歧视性数量限制、歧视性反倾销、反补贴标准及技术的出口限制，并可作为发展中国家享受比发达国家更低的关税。良好的国际环境将带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起飞。

与因取消非关税壁垒而使家电、汽车制造业等民族工业所受的冲击相比,中国复关显然利大于弊。

为了取得GATT门票,1986年7月10日,中国政府照会当时的GATT总干事邓克尔要求复关,拉开了复关帷幕。次年3月,GATT宣布中国工作组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

1987年10月至1992年2月,中国政府先后10次派团参加GATT中国工作组会议,议程是审议中国外贸体制备忘录并相继回答缔约国提出的有关问题近2000个。

1992年2月13日,GATT宣称基本结束对中国外贸体制的审议。

1992年2月至1993年10月,中国工作组举行了第8次至第15次会议,拟定复关协议书及关税减让问题,并正式提交日程。

其中,1992年10月举行的第9轮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达成了《关于市场准入的谅解备忘录》,结束了长达一年半的谈判。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复关,推动复关进程,谈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步入关门,似乎已稳操胜券。然而,谈判场外的阴晴变化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1993年5月15日至17日,日内瓦第13次会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提出中国应大幅度减低关税,承担增加从发达国家的进口额和接受特别的保障条款及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取得

美国无条件延长最惠国待遇等等。

分歧逐步拉大,谈判陷入困境。

尽管此后谈判又“阴转多云”、“多云转晴”,但毕竟1993年悄然而去。

商战狼烟

在与GATT缔约国漫长而曲折的谈判中,中国人深深感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点燃的商战狼烟。

第一缕狼烟:提高中国复关的“入门费”。

美国谈判小组曾照会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提出十分苛刻的“价码”。主要包括中国必须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并必须以自由民主制度作保障;第二、三级产品如原材料、服装等以劳务为主体的非高、精、尖技术不能向国外倾销,以使美方获得最大利益。对此中方陈词力争,未作妥协。

第二缕狼烟:将台湾入关作为政治筹码。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台湾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台提出的作为独立关税区加入GATT的要求反应积极,中方对此据理力争,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谈判,终于使美国等国作出决定,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GATT理事会应首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议定书,具体表述以不违背联合国258号决议为基准。若中国复关必须先于台湾2小时,台湾复关一切事宜须与中国商定。

第三缕狼烟：减少中国的进口配额。

今年1月6日，美国突然宣布199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纺织品的配额将比1993年减少25%至35%，总价值达20亿美元。所谓理由是中国制造的纺织品通过第三国非法转入美国市场。此举引起了中国强烈反应，美国国内商界也顿起一片反对的呼声，中美双方又坐在了谈判桌前。经过中方的努力，于1月17日在北京达成协议，为中国复关减少了一个干扰因素。

一缕未灭，一缕又燃。

中国复关谈判场上硝烟弥漫。

复关情结

中国人依然努力着。3月中下旬，当八届人大二次会议胜利召开时，中美两国的高层会晤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江泽民对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中美关系应该好起来，应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李鹏说，中美经济互利性很强，两国经贸关系迅猛发展，贸易额已达276.51亿美元，比1979年增加10倍多，……

中国为了早日取得GATT的门票，8年来严格按照GATT的国际通行规则，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仅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短暂的时间里，即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举措，如改革现行外经贸体制、外汇

体制、调整关税、取消许多产品的进口配额管理等等，推动了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

中国对GATT的友善态度以及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令GATT不少缔约国纷纷将选票投入中国的票箱。

今年3月18日结束的GATT中国工作组第16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受到了缔约国的普遍欢迎。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中国举行了关税减让谈判，并纷纷表示没有强大的中国参加的世界组织是不完全的。欧洲共同体向中方提出了一份中国复关协议书草案。

中美最后一次双边磋商结束后，中方代表团秘书长龙永图说，缔约国代表认为中国复关条件已经成熟，并已得到了除美国之外的所有缔约方的支持。中国平等互利的立场不会改变，个别国家想利用中国复关敲一杠子的目的不会达到。

在WTO誕生日趋逼近的今天，美国仍然在知识产权、劳改产品及市场准入等协议上与中国纠缠不休，使中国复关谈判艰难曲折、复杂纷纭。

复关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复关更能振兴经济，使中国扬眉吐气走向世界。因而中国人必须作出艰苦不懈的努力。

（摘自《南风窗》1994.6.金力文）